总书记重要回信激励电影工作者 朝着建成电影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 文/王若妍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艺术家们塑造的银幕形象,激荡着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抒写了历史回望、时代变迁的光影传奇。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给8位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中说:“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广大电影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对电影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鼓舞和激励。重要回信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感染力,为推动电影高质量发展、建设电影强国提供了遵循。艺术工作者应有崇高的艺术理想,而艺术理想的实现就是要在艺术实践中以人民为中心,回应时代召唤,厚植生活土壤。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电影人的创作根本。回望中国电影史,其开端并非在轻松的氛围中萌芽,而是在西方电影语言强势影响下艰难破土。然而,中国电影人并未在陌生浪潮中迷失方向。他们迅速领悟到:唯有真正潜入民族生活的深水区,方能在银幕上树立起属于东方的文化脊梁。早期默片《神女》中,阮玲玉饰演的那位为儿牺牲的母亲,其深沉痛苦与无言坚韧,正是从底层百姓生命最深处打捞上来的悲悯珍珠。导演费穆也强调“中国电影须有自己民族的形式”。他在《小城之春》中,巧妙运用传统绘画美学意境,以低回婉转的笔触绘就一幅极具东方韵味的时代情感画卷。这些作品,在艰难起步的岁月里已经默默播下自信的种子——在民族土壤中扎根越深,艺术之花才越能绽放独特魅力。

第二,回应时代召唤是中国电影人的使命所在。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艺术在崭新社会语境下焕发新的生机。田华、王心刚等一代电影艺术家,将艺术生命全然融入时代洪流,不断锤炼技艺、塑造经典,走进群众,从现实土壤中挖掘创作灵感。田华在《白毛女》中饰演的喜儿,从天真烂漫到悲愤复仇,每一处情感转折都浸透了她在农村与女性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心血结晶。这种回应,是游本昌92岁入党时胸腔里“渴望光明的少年的心”,是“不问开花,只问扎根”的匠心,更是穿越浮华名利、直抵精神本质的生命之光。当田华以97岁高龄捧起终身成就奖杯时,她布满岁月痕迹的双手托起的不仅是一座奖杯,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信仰——它不因掌声而膨胀,不因沉寂而熄灭,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如灯塔般指引方向。

第三,扎根生活沃土是中国电影人的动力源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电影迎来了更为多元的表达空间。田华曾经回忆自己塑造角色的过程如同“揉面”:“要反复揉搓,把生活揉进去,把人民的情感揉进去。”新时代的创作同样需要这般功夫——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提取精髓,在时代脉动里捕捉人民最真实的心跳声,最终熔铸成具有史诗气象与永恒魅力的精品。中国电影人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开放胸襟拥抱世界电影语言,使中国故事在国际视野中熠熠生辉。陈道明在《归来》中饰演的陆焉识,历经沧桑却爱意深沉,其内敛克制的表演艺术,将生活中观察到的隐忍与厚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表演风格,不仅深深扎根于对人生际遇的深刻理解,更凝聚着对民族性格的深沉体认。同时,新时期的电影人亦勇于向世界讲述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故事。如《流浪地球》系列,在科幻外壳下包裹着浓厚的故土情结与集体奉献精神,“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家国情怀正是基于对中国人安土重迁生活观的理解,其宏大的视觉奇观之下奔涌着的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价值血脉,在拥抱世界时依旧清醒地守护文化基因。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电影肩负着更为宏大的使命。正如潘虹所说,“文艺作品是一个时代珍贵的‘横截面’,留下传世精品,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文化自信绝非虚无缥缈的口号,它源自那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沃土。中国电影120年的历史证明:真正能穿越时间、激荡人心的作品,无一不是从生活的深井中汲取的清泉,无一不饱含着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的深情凝视。中国电影人应牢记总书记的教导,学习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的优良传统,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与热火朝天的现实当中去汲取养分,保持创作热忱,推出更多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风貌的好作品,朝着建成电影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风起前的蒲公英》:流动少年的音乐逐梦之旅

■ 文/陈一诺

北京南五环外,一座由废弃厂房改造的校园里,乒乓球台上晾晒着白萝卜干,斑驳的墙面上跳跃着孩子们手绘的涂鸦。跟随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的镜头,很多观众第一次走进位于北京大兴的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第一所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公益性学校,也是影片故事开始的地方。

2017年,当大兴国际机场建设的轰鸣声逼近,这座承载着千百个流动梦想的校园即将搬迁,影片的镜头跟随合唱团的四个少年与音乐为伴,求学、追梦又遭遇挫折的成长历程,用两年时间记录下他们在城市变迁中的青春脚步,带领观众去探视每个孩子不同的内心世界。

13岁的“学霸”权煜飞,排练时总是笑眯眯地调皮捣蛋,看似天真的他经常说出一些“小大人”般成熟的“金句”。他非常享受在合唱团的美好时光,变声期被迫退团时,还不忘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写上自己的名字。

来北京七年的张展豪是合唱团里的“孩子王”,会弹吉他,因为考试失败两进两出合唱团,被回乡择校纠结到几度流泪。

内向的王路遥刚进团时唱歌声音很小,升初二后,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唱出了属于自己的高音,还自告奋勇当了团长。

初一的冯小云是合唱团里第一个唱出“High C”的女孩,有音乐天赋,有父母支持,却意外和一次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擦肩而过……

《风起前的蒲公英》中,这些孩子的人生并没有因为音乐而“逆袭”,因为生活本身就是逆袭,他们一如既往地跟随父母在这个无根的城市里来来去去。影片只是安静地记录他们的成长与困境,似乎告诉人们:成长中,失败也是孩子们要学习的重要一课。

张展豪小心试探着父亲对音乐的态度,一次次被拒绝;王路遥因成绩下滑被父亲强行退团时抑制不住向老师哭诉;冯小云因“礼仪问题”被专业院校拒之门外,眼中满是困惑和失落;还有权煜飞在演出归途的出租车上,疲惫地说出那句令人心疼的话:“每个人都是好苗子,有的栽在黑土地,有的栽在红土地,有的栽在沙漠里。”

影片里每个孩子几乎都哭过,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都先后面临着自己小小梦想的破灭,但悲伤的情绪并没有一直缠绕着他们。

片中,孩子们用不完美却真诚的嗓音,在合唱团里追逐梦想;在教室的纸飞机上写下理想,又悄悄划去。他们在搬家、转学、落选中练习“告别”,也在每一次歌唱中重新拾起勇气。孩子们讨论学校食堂豆浆哪一轮最甜,偷偷躲在窗边听排练,鼓起勇气请明星合影,哪怕参与正式演出因为不被信任而遭遇“被迫假唱”,也保持着好奇与兴奋,排练间隙在场馆地上抱着打滚——他们最自然的表现往往是“童真”最真实的模样。

《风起前的蒲公英》被誉为“中国版的《放牛班的春天》”,因为它不只有着动人的合唱,更讲述着关乎人生的聚散、成败、梦想,同时尝试切入留守儿童、城乡差距和素质教育等议题,并提供角度不同的思考。但相较于《放牛班的春天》的理想主义,本片更接近生活的“毛边”状态。影片不加评判地去看待每一个角色,以客观的视角呈现老师、学生和家长各不相同的思考,也让观众在情感层面共情每一方:合唱队负责老师的殷切期盼、孩子们的懵懂热爱、家长们的忧虑迷茫。这样的真实和细腻,让影片足够动人。

影片没有使用旁白解说,而是通过稳定考究的镜头,捕捉人物的生活细节和现实中打动人心的气氛,“静观”蒲公英中学合唱团内外的生活日常:开学典礼的喧闹、柿子树下的嬉戏、写给父母的信笺上晕开的泪痕……为了能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摄影机被降至1.5米的高度——当孩子突然望向镜头,那些未被剪掉的“对视瞬间”,恰是生命自发袒露的印记。

宿舍里永远收拾整齐的行李箱,父母出租房里的租房合同,墙上褪色的奖状,带蒲公英标志的校服……漂泊不定,是《风起前的蒲公英》里孩子们生活的底色。他们如蒲公英般流动,随着父母的工作变动或回老家升学,一场又一场的离别在校园里上演。合唱团里有些孩子刚学会唱一两首歌,就要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了。影片以诗意的洞察将蒲公英转化为命运象征,这些随时可能会转学离开蒲公英中学的孩子就是一株株“蒲公英”,短暂相聚后注定会被命运带向各方。

但作为一部关注“流动少年”的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并没有刻意展示生活的苦涩,片中的温暖轻盈有时甚至让人会心一笑。正如导演所说,蒲公英中学跟他想的并不一样,无论是墙上的涂鸦装饰,还是合唱团本身的存在都让他拂去了沉重,从而感受和回归到音乐和纯真的本质。当然这份温情和力量也被传递到影片中,单纯聆听少年们的歌唱已然是观影的无穷享受。

《风起前的蒲公英》的故事在新校区的合唱课里结束,音乐老师照例需要统计新学期准备离团的人数,阳光洒在崭新的琴键上,新一届团员的歌声响起,带着上一届的影子却又充满希望。

影片里,权煜飞说:“蒲公英飞散前,总要把最美的样子留给风。”蒲公英的种子终要远行,那些离开合唱团的孩子,也早已把音乐变成成长的养分。当年唱《四季的问候》的孩子,如今虽然没有以音乐为职业,但人生路上或远或近与音乐同行,让他们多了一份坦然前行的力量。在风起时,依然“放声歌唱”,这是一种蒲公英般坚韧的勇气。不是所有梦想都能开花,但每一次坚持都值得被看见。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电影《天宝》:文献性真实与诗化的表现

■ 文/杨 蕊

电影《天宝》作为一部描述藏族青年革命故事的影片,导演刘劲对民族性、宗教性和革命性的平衡与诠释,超出了同类题材在观众心中的既定印象,既带来了新鲜的审美体验,也成功引发了观众对这类题材影片的好奇与期待。

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再现和创作需要审慎且坚定的历史观,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如何能够在尊重藏族和汉族各个民族感情的前提下,尊重史实、历史观,保有个性的同时又能兼具普遍性,让所有民族能够感同身受,将西藏解放的故事讲完整、讲精彩,成为了创作者面临的首要难题。笔者曾对昌都解放作过调研,了解该时期民族融合意愿较高、人民交往普遍化的情况。在观影前就十分好奇跨越如此长的历史间隔回望,主创团队会以什么视角拍摄和叙述这段庞杂的往事。

本片在剧作上有扎实、极致的表达,舍弃强烈的戏剧冲突,反而采用了一种文献性的文学语言来讲述。这样一种文献性电影历史题材处理方式在叙事上最大程度地贴近了现实和史实,也贴近了当地民族情感的现实。其中演员对于人物的塑造准确生动地传达了影片超脱于物质至上的情感属性,将人性的朴实与真挚,跨越时空相连。

阿坝州是整个红军革命历程上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本身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和宏观革命视角叙事的可能性。本片没有选择宏观的全景式拍摄方式展现当时的风土人情,而是从主角天宝的心路历程出发,大道至简,突出了情感对影片的支撑性和引领性。片中所蕴含的情感能量离不开主创团队朴实的情感投入。导演刘劲将自己在阿坝州的生活实践经历输出到电影中。在藏汉两族人民情感对接中,丰富了天宝这一角色的厚度和可信度。跟随他个人视角下的叙事和角色的心路历程、个人情感的再现,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观众完全能够进入到他内心,该影片四两拨千斤地以小人物视角的内心冲突展现宏观革命的始末,保留了文献性的真实。这些对史实简洁勾勒性的表达与贴地性的叙事,让观众借由本片看到了红军在阿坝州革命历程全貌,使本片被赋予了更多的记录功能和文化价值,弥补了国产电影这部分缺失的拼图。

对于藏族佛教和红色文化基因的交融,本片采用独特的叙事特点,找到了一个诗意化、高度凝练的表达方式,呈现了小扎巴天宝内心宗教观念的变化。强调和渲染他个人视角下,红色的身影在他心中扎根的过程,并借此展现了红军过草地这种意像的某种崇高神性。片中细节繁多而缜密,共同将“苦难”这一不可避免的话题给出了更高级的处理方式。通过视听对“苦难”的诗化,没有让内涵变得浅薄,而是让它在苦难的历史真实之外,拥有了某种牺牲与奉献的神性抒情意义。

关注该片的情感脉络不难发现,片中展现的三次牺牲也和宗教性密切相关,哪怕是马的牺牲,都是浓墨重彩的塑造,有穿透银幕直击观众心灵的震撼力。牺牲和救赎作为世界上大部分宗教的基本议题,牺牲带来苦难,苦难带来崇高,某种程度上强烈影响了天宝内心的变化与冲突。

藏族同胞接纳解放军进藏所有的过程是有迹可循、有据可依的。藏族人民加入解放军、被授予汉名的那场戏,极具命运感和仪式感。当时在阿坝州有七十多位藏民加入了解放军,片中所提炼的几个角色作为代表,完成了这场有宗教神性的命运仪式。跟随角色的“我原来藏名是什么,汉名是什么”,在命运带领下走过了一趟重生般的情感体验。这种再度命名的细节强化了电影氛围,变成一种象征,实现了戏里戏外角色与观众的联动和情感的释放,令人动容。

影片是以小人物视角出发,真实再现了当时文化交融时期藏汉同胞一点点互相接纳的过程。无论是其中的文献真实性还是另外一个极端诗化的表现、宗教性神性的手法,都借由生动的象征,实现了角色和观众之间的强互动、共命运的实感。而这一切,无疑归功于主创团队对于本片创作、对于电影艺术的赤诚之心。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编剧、导演)

讲好中国故事,小屏蓄力看齐大银幕

■ 文/沙 扬

自2019年创办首届短视频大赛以来,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始终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积极探索“赛事+论坛+巡讲”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致力于把每年一届的大赛打造成短视频创作交流和文艺志愿服务协同发展的品牌项目,进一步激发短视频在传播正能量、构建主流舆论格局、培育中国电影新时代群众基础中的重要作用。

2025年1月至7月,第六届短视频大赛暨第四届大学生短视频大赛如约而至。本届大赛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设置“文旅之美”“AI新视界”“我与上海电视40年”三个板块,面向全国征集纪实、剧情、动漫、公益广告(宣传片)、音乐等5大类别的5分钟以内的视听作品。

本届大赛征集到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浙江、安徽、山东、湖南、广东、新疆、甘肃、江西等省市的社会投稿3300余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武汉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西南石油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等122余所高校投稿超过470部,质量和数量再次创下新高。

经过数轮评审,大赛最终共选出六十部获奖作品,包括社会竞赛单元六部最佳作品、八部优秀作品、十部好作品和十六部入围作品,以及高校竞赛单元“十佳作品”和十部入围作品。在获奖作品中另颁单项奖8个,包括:最佳创意、最佳视觉、最佳制作、最佳系列、最佳叙事、最佳人气各一部以及两部优秀传播奖。脱颖而出的获奖作品在线上展映期间收获了超过5万人次的阅读、点赞和转发量,形成了线下线上互动共振、创新传播中国故事的喜人局面。

与往年相比,本届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观赏性和艺术性方面有了进一步提升。具体表现在:人物形象更鲜活,情景交融更深入,技术赋能更多元,艺术风格更鲜明。获奖作品里涌动着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自豪感与信念感。比如,《75年 我们正年轻》借由“爷孙俩视角”的巧妙构思和虚拟制作技术,开拓了讲述国家大事类题材的创作新思路。《铿锵小玫瑰》捕捉了浦东新区六团小学女子足球队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和独立自强的人格闪光点。《人均70岁的资深少年口琴乐队》通过胡贤强和伙伴们鲜活的语言,点出老年人音乐梦想与爱国热情相结合的深刻涵义。《LINE》则用长镜头调度在实景中依次展现了家庭、学校、职场三个抽象情景,用虚实结合的寓言效果言说大学生的就业焦虑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

本届大赛还举办了7场短视频创作系列公益讲座与创作论坛,吸引了线下逾3000名观众参与,助力创作爱好者提升短视频创意思维与制作应用技巧,学习电影美学和创作思维,为迈向短片和电影长片创作打下基础。

从短视频迈向大银幕,大赛致力于打造并发扬三大特色:一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坚守。倡导创作者、尤其是青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身边的现实生活出发,讲好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二是深挖中国故事的格局定力。大赛的舞台开放给每一位立志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者,鼓励创作者和观众一道打开“慧眼”,从中国电影美学中汲取养分,持续讲述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三是传播中国故事的创新语态。大赛鼓励参赛者带着自信开放的姿态和积极向上的能量迈向大银幕、继续征服观众之旅,为对内凝心聚力、对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讲好中国故事”并非一日之功,既需要大银幕在前冲锋引领,也需要其与包括短视频在内的创新传播形成协同效应。我们热切期盼着,大赛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创意之都的上海活力,继续努力推动“思想+艺术+技术”的融合传播,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